



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的特展“亚洲在阿姆斯特丹”展出的
17 世纪来自亚洲、模仿亚洲风格的器物 周文翰供图

◀（上接 9 版）

界贸易格局中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中看中医中药的西传，恰好反映出中国本土学者在对外宣传中医中药上的被动无力和中医中药在世界医学网络中的被边缘化。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喜悦和满足。

但中医中药传到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效应是否会不同呢？因为当时汉字是邻国人民能通读的语言。的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肖灵芝研究员的论文《中医古籍域外拾珠》描绘的是另一幅场景，她列举了 8 部早期珍贵的中医典籍流传到邻邦的情形，如唐代官修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早已在本国失传。由于当时即东传日本，后来的抄本才得以流传下来，弥足宝贵。同样，中国最早的北宋人体解剖原图也已亡佚，但借日本镰仓时期的医籍《万安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除了药用植物，大批观赏植物也西传欧洲。记者、策展人、作家周文翰先生西行万里考察西传的中国植物，成果已收在其散文集《花与树的人文之旅》（2016）中，此处不赘。英国当代学者基尔帕特里克（Jane Kilpatrick）在其《来自中国花园的馈赠》（*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2007）中写道：“我们欠中国园丁的情，我们必须要向他们道谢。”今天在欧洲司空惯见的桃花、牡丹、梅花、玉兰花、茶花、玫瑰、绣球花、竹子等等，其实都是来自中国。感恩和谦逊是人类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此道之不行，久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1 2 月 29 日，柏林。连日阴雨，一直宅在家里，实在气闷。既然不能去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看瓷器，能就近看看普鲁士的皇家瓷器厂（Koenigliche Porzellan Manufaktur，简写 KPM）也好。该厂是那位自称“国家第一仆人”的腓特烈大帝于 1763 年从私人手上买下，比迈森瓷器厂晚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有 250 多年。“皇企”的一大亮点是拒绝童工、设立企业医保和退休金、照顾鳏寡孤独，成为日后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先驱。

看着这些瓷器业的后起之秀和百年老店，我感慨不已：这些欧洲“学生”的产品目前已占据世界各大百货商店的橱窗，价格昂贵，一个普通白瓷杯也要价 60 欧元以上，而瓷器祖师爷中国的瓷器则在西方商店踪影难寻。想起与会的日本冈田美术馆副馆长寺元晴一郎先生的发言——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甚至可说是膜拜。他说，人才是最重要的美术品，只有中国人才在古代造出了鬼斧神工般的瓷器珍品，成为东西方其他国家的老师。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人，人伟大，产品才会伟大。这样的人、这样的产品，才会影响到使用者的灵魂。

瓷器也是那些年代的奢侈品和时尚品，只有皇室、贵族和僧侣才消费得起。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的王文欣博士的论文《十七世纪全球贸易与消费中的“赤壁赋”瓷器》视角独特，梳理出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以北宋苏轼创作的《赤壁赋》为主题的瓷器的外销情况。一艘带有船篷的小舟和三名男性围坐于一张几案的图景，有几个西方人能理解？更不用说印在瓷器上的中国文

字。但就是这样一种外销瓷，却热销世界各地，日本、英国、荷兰、德国、土耳其的博物馆收藏即为明证。它们也散见于马来西亚、印度和埃及的考古遗迹。循此痕迹，可勾勒出赤壁赋瓷外销的线路——从 17 世纪始，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先船运到阿姆斯特丹，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则派人在那里搜求中国瓷器，如欧洲对赤壁赋瓷的最早著录就出自显赫的瓷器收藏家、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赤壁赋瓷在欧洲的销售，正表征出“中国风”在欧洲所呈现的热度。

运抵欧洲的珍贵中国瓷器，有些主人竟然还要对它们进行改装和重饰，为什么？复旦大学文博系的刘朝晖教授和硕士生崔璨合撰的论文《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和重饰：以 17 至 18 世纪法国的金属镶嵌为中心》指出，这种现象明清时期在法国较为普遍，并在欧洲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既有审美上的需求，也有炫富的心态，还与对异域的想象有关。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产品如何适应欧洲文化提供了一种讨论的路径。

以上两篇论文涉及皇室和贵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在《瓷器上的天主》一文中则专门讨论了基督教僧侣与中国瓷器的关系，这是以往学者很少关注的视角。他说，中国生产的带有天主教题材的这批瓷器，很少出现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欧洲的贸易公司或商队的贸易订单，一般只记录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信息，不会描述瓷器上的纹样；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我们对此类瓷器具体的订购者、制作者、运输者、使用者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似可从三个方面加以探

讨：一是把这批瓷器放在东西方陶瓷器与宗教信仰的传统脉络中加以考察，欧洲人向中国订制这类瓷器，是其原有传统的延续，只不过中国的瓷器比欧洲本土的陶器更加精美。二是此类瓷器的用途：各修会定制的带有修会会徽的瓷器，一般是供该修会神父或修士在教堂或住院使用，或用于生活，或用于装饰。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会所属的澳门仁慈堂的瓷器，其中一些是用于盛药的药罐。三是从纹饰风格上看这批瓷器的跨文化变化，包括人物身材走形和出现中西合璧的题材，但这不能视为天主教本土化的表征。

1 2 月 31 日，柏林，西方人的除夕夜。去年此时还兴致勃勃地在裤裆大街看彩灯和烟火，今年则不敢去热闹地方。幸好波茨坦的一位华人朋友邀请参观其新购的一座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文保大别墅，我才得以再次外出游玩。别墅内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浴室里的瓷砖：图案是鲜艳的罂粟花，绿叶衬托着红花，极为艳丽生动。主人介绍说，瓷砖是 17 世纪荷兰制造的。这提醒我，老房子藏有新史料，亟待搜集和整理。罂粟的产地在亚洲，中国虽不是主要产地，但这幅瓷砖却明显呈现出中国画的画法，这瓷砖的背后，至少涉及荷兰、德国和中国；罂粟和中国画法，是否又涉及植物、外销画和外销瓷三个方面的中器西传？瓷砖的发源地是波斯，先是传到西班牙、葡萄牙，再传到意大利、荷兰，荷兰人受到来自中国的青花瓷颜色的启发，发明了风靡欧洲的青花瓷砖。从瓷器到瓷砖，反映着中国制造的发散性的传播和影响，值得触类旁通，扩大研究范围。

此时此刻，又想到波茨坦的无忧宫里的中国亭——中国园林西传德国的痕迹，脑子里浮现出会议上所讨论的中国园林在西方传播的议题。暨南大

学历史系纪宗安教授在其论文《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中提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岭南正是中西园林艺术双向交流的地方，中国园林艺术从这里走出去，西方园林从这里走进来。英国宫廷建筑师钱伯斯爵士（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曾访问广州，后来他主持英国皇家园林时在邱园内修建了砖塔和凉亭。而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广州的私家园林更是“番鬼”们经常造访的胜地。

说到中国园林被引入英国的历史，就不能绕过钱伯斯之前的另一位爵士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他才是把中国园林艺术引入英国的第一人，而且他用一个怪词 Sharawadgi 来表述自己的园林美学观念，这一词多年来聚讼纷纭，有人说它源自汉语，也有人说它源自日语。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和自由撰稿人吕澍合撰的论文《Sharawadgi 寻踪》详细梳理了该词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坦普尔在担任英国驻荷兰公使期间从荷兰著名外交家和诗人惠更斯（Constantijn Hagens, 1596—1686）的私人庄园接触到东方园林，而惠更斯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过来的日本和服上的山水图案接触到日本园林。其实两人都不懂中、日文，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接受了经由日本转手的中国园林艺术。那么，坦普尔发明的怪词 Sharawadgi 似中似日又非中非日，就毫不奇怪了。重要的是，他的充满想象和误解的中国园林概念，却极大地影响到 17 和 18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而这一思潮又反过来影响到英国园林的观念和营造。历史的实相往往出人意料。

2 017 年 1 月 4 日，柏林，气温骤降，雪花飞舞。电视里正播放意大利拿波里的风光，让我想到自由撰稿人许敏

（下转 11 版）➡



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国亭